

现代性与社会平衡

——关于政治生活意义的思考

商红日,朱 翊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使人类的行动合乎理性,这是现代性的逻辑。人们的集体行动达成共同理性,其客观的结果或表现形式是社会平衡。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是维护社会平衡的重要领域。现代政治生活的根本意义就是维护与发展社会平衡的状态。

关键词: 政治生活;现代性;社会平衡

一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思想中,现代性意识被理解为主体性的觉醒、权威基础的转变和人类解放的思想。肇始于笛卡尔的理性向度的现代性和源于霍布斯、洛克并经过启蒙思想家加以完善的现代性,奠定了这种理解的基础。现代化的过程也正是现代性的这种理解向现实生活不断推进的过程,在韦伯看来,这一过程是世俗化和世界观的合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世界的解释权已经由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易手为现代科学、功利主义道德等现代文化形式。

吉登斯进一步说明,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具体地说,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1](P128)}除了世界观的理性化即具有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之外,吉登斯还阐明了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内容:市场经济系统和民主

政治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工业文明。

华勒斯坦将现代性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实与一种特殊的世界观的组合^{[2](P71)},但是他并不认为两者是正相关关系。他说,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现代性,其一是积极的,即技术现代性(包括关于技术的世界观和社会现实);另一是否定意义上的,是对狭隘的、教条主义的中世纪的反对——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其中,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对政治变革正常性的认定(以合理化为目标的变革是常态的,不变革才是变态的)和主权在民的认定(即合法性观念的转变,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价值或信仰都无法说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二战以后,现代性开始受到严厉批判,后现代主义思潮泛起。德勒兹、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尔以及罗蒂等人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谱系”。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的“中心指向”、“结构化”、权力“控制”、“共识法则”等等,提出了分解中心、解构、多元抗争、意义消解与仿真等等观

收稿日期:2005-03-30

作者简介:商红日(1956-),男,黑龙江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研究。

朱 翊(1982-),女,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念,试图提供人类克服现代性“病理”的方案。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阿伦特、列维纳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人代表,出现了重建现代性的尝试。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构成了分析现代性危机与重建现代性合法性的独特视角和基础。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而是将现代性看作需要人类持续努力完成的计划,例如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启蒙理性的压抑性,另一方面倡导与完善启蒙理性的进步与解放的内容。^{[3](P174)}

现代性的论争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密切相关,批判性、反思性和建构性成为这场论争的基本特点,现代性的否定与现代性的扬弃成为论争的核心内容。从寻求摆脱人类困境的意义上说,这种论争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如果静观这场论争,人们也不难发现,所有的参与者不论他们创造并使用了何种理论工具,他们都没有超出现代性中的技术理性的范畴,即使是后现代理论家,每个人也都向社会推出了自己的治病“良方”,似乎他们所创造的“技术”才是更有效的。应该说,重建现代性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家们更直接、更坦诚、更积极,他们的取向具有更大的价值。

二

使人类的行动合乎理性,这是现代性的逻辑。“行动”几乎成为20世纪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20世纪出现的诸多问题,并非来自于理性的过度使用,而是行动超越了理性极限的表现,它们并不能用来证明现代性已走入死胡同,相反,它们给人类上了一堂再启蒙的课。作为现代性的逻辑,使人类的行动合乎理性,即人们的集体行动达成共同理性,其客观的结果或表现形式是社会平衡。这种社会平衡是具有历史超越性的平衡,它反映着理性的力量和理性的进步。

现代社会是一个包括国家、政党等内容在内的体系。社会平衡首先是指社会生成自我平衡机制的过程。一个呈现稳定状态的社会,在遇到某种干扰而出现裂痕时,能够很快自我矫正。一个和谐的、没有许多“痛感”的社会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可以视为实现了平衡发展的社会,即能够自我调整的社会。其次,如果社会系统内各个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

子系统是平衡的,那么它就足以抵挡外界的邪气侵扰和内部的微小失调。而如果它们不能平衡,即过或者不及的时候,正就不能压邪,病征就会表现出来。这是社会平衡的另一个含义。这层含义强调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调适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平衡的目的性和优先性。当我们倡导什么样的经济、什么样的政治和什么样的文化的时候,必须首先明确,经济的目的不是经济本身,政治如此,文化也是如此,它们各自如何发达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们如何相互平衡而保持和谐。“当我们不是全力地去消除我们自己产生的危害时(也就是说是一种‘平衡功能’),保留和改善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形态的人文状态就只是一个吸引我们注意(一种‘优化功能’)的梦。”^{[4](P195)}所以,平衡要先于优化,对于转型期社会来说,意义尤甚。再次,社会平衡是社会经历历史变迁过程而形成的总体进步状态,它并不一定代表着人类的理想,但却是人类可以接受并能够进一步改善的状态。理性的极限制约着人类的计划。人类在20世纪所犯的诸多错误,其中大部分全在于用有限的理性去追求无限的理想。只有保持和发展总体的进步状态才是与人类理性相契合的。

社会是个人生活的场所,也是所有人生活的场所,所以,共处于一定社会中的人们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就个人生活而言,首先,人的生命活动无论如何都需要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中有专门从事生产或者服务于缔造物质文明的机构,并且相互交往构成一个系统,我们称之为经济生活,它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核心。其次,人不可能没有精神需求。所以,我们有称之为文化生活的社会系统(此处文化指艺术、道德和科学创造的过程)。两个系统不能相互取代,因为它们的存在是各自独立的,但是由于它们拥有共同的主体,所以又不能摆脱相生相克的联系。

但是,在共有共享的社会条件下的个人与集体的生活还需要规则,因为很显然,没有它们人们就会陷于混乱。这个事实表明,理性的人组成为社会以后,具有形成“共同理性”的可能性。习俗是成文之前的规则,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基础,但是总有人宁愿承受破坏习俗的代价而违反规则,所以人们将一些基本的、合理化的习俗进行制度化,

并赋予其最强大的暴力后盾,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以此为核心的活动称为政治生活。虽然习俗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社会的发展会使之越来越趋向合理化,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如何看待政治和习俗的关系?习俗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还可以是所有成员共有的,而政治仅指最后一种。这是因为,从规范意义上说,政治必须是“公意”下的关于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经济与文化系统是个人(包括个人化的集团意志)价值观显现的场所,而政治不同,它是体现“公意”的场合。在这三个系统中,人们用三种交流的媒介来开展生活,其一,语言;其二,金钱;其三,权力。这三种媒介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同时存在于三个系统中,并形成复杂的联系。

限于理性的极限(个人的和共同的),很少有人对社会风气、社会习俗、生存环境等长期投资感兴趣。这无形中就破坏了社会的平衡,使社会中某些系统极其充裕,而另一些则极度贫乏,这是不健康的社会发展模式。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出现的各种负面现象,确实在侵袭着社会的肌体,使社会的能量被不停地蚀耗,直至社会失去平衡。问题的根源在于: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行动所需要的共同理性严重缺失,个人乃至集团在在行动选择中,逃避自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样,权利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自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平等流于形式。这是违背现代性逻辑的结果。

现代性的首要功绩是为社会创造了总体进步的状态,但它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升人们的理性,特别是不断形成共同理性,以此来引导和规

范人们的社会行动,保护和发展社会的总体进步状态。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只是作为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问题被讨论,甚至在后现代哲学那里,哲学家们还要努力破除这种共同理性的观念,反对这种共同理性的形成。这里所强调的是:改善人们的政治生活实践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现代政治生活在社会平衡中的作用不是被扩大了,而是被缩小了。正像人们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总统与议会选举、政党政治等等现代性的产物,都正在蜕变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们延续现代性的作用日益萎缩,这不能不是我们思考现代社会平衡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是维护社会平衡的重要领域。通过改善或创造合理的政治生活,人们在其中经受教育,达成共识,采取共同行动,从而有效促进或维持社会平衡。可以说,现代政治生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使人们的行动具有合理性,即形成共同理性,从而促进社会平衡发展。如果讨论现代政治生活的意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 汪行福. 通向话语民主之路[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 [2]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自由主义的终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3] 余碧平. 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 [4] 杰弗里·维克斯. 判断的艺术[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Modernity and Social Balance: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life

SHANG Hongri, ZHU Yi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s to rationalize human behaviors. Common rationality originates from collective activities. Social balance is the objective result and formal manifestation of common rationality. In modern society, political lif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aimed to build up social balance.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modern political life consists in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 balance.

Key words: political life, modernity, social balance

(责任编辑:苏建军)